

## 清商远路自徘徊

罗新

二十多年来，田先生时时刷新我对于人生的理解，我看到了学者的纯粹和人生的朴素。他经常聊起过去的人和事，固然也流露对于恶政当道的愤怒，但对那些在极端时代做了许多坏事因而后来恶名昭著的人，他似乎总有一种深深的悲悯，甚至以同情的语气讲述他们的人生遭际。反过来，一些后来被评价很高的名流人物，到了田先生的回忆里，原来也做过许多他们后来竭力回避或予以否认的事情。我甚至觉得，田先生研究历史上群体和个人在时势变局中的反应与选择，多多少少隐含着他自己人生所见所闻所思的总结。

我1989年秋季回到北大读研时，对于历史学不要说不入门，就连历史系一般本科生的水平也达不到，两个导师的论著，田余庆先生的我只读过《中国史纲要》，祝总斌先生的我只读过《北大学报》上的两三篇论文。入学不久，大概基于本研究方向的一个传统，祝总斌先生带着我去拜望周一良、田余庆两位先生。表情凝重、浓眉微锁的田先生，一开口就浇了我一头凉水：“从中文系、外文系改到历史系来的，少有成功的先例。”那时我并没有铁了心要长久学历史，田先生的话倒也没有让我太沮丧，不过内心还是有一点抵触，觉得他不免小看人。相比之下，笑意盈盈的周先生的话就好听得多：“中文系的门槛高啊。”那时我绝对没有想到，就是这个第一次见面让我多少有些排斥感的田先生，成为我后来人生中最亲近、最重要的人之一。

研究生的第一年，只是跟着祝先生读《资治通鉴》，听各种必修和限选课，和田先生基本没有接触。让我慢慢领悟到历史学自有独特魅力的，最初就是祝先生讲授的政治制度史，有了制度史的知识和视角，读《通鉴》和正史就不那么艰难了。一般听过祝先生讲课的，终身难忘他的博学、缜密和通达，更不要说直接受惠于他那仁圣风范的言传身教了。这一年里，有一天我偶然在《历史研究》上读到田先生的《隆中对再认识》，大吃一惊，原来历史论文可以写得这么引人入胜。于是找来《说张楚》《论轮台诏》以及刚出版的《东晋门阀政治》，读得昏天黑地，如痴如醉，常觉心潮澎湃，喘不过气来，不得不休息一下。这种阅读体验，我以前除了读小说，只在读梁任公《清代学术概论》时感受过。

我开始有“入门”的感觉，是研究生第二年的第一学期。那时田先生正在写《孙吴建国的道路》和《暨艳案及相关问题》，他就着这个机会，召集几个研究生开了个《三国志·吴书》读书班。先是他自己选读一两个列传，从文献解读到史实考证，再到历史意义的阐发，再到论文的写作，是一个完美的示范。随后由我们学生轮流自选《吴书》中的某个列传，用同样的方式来讲读。我记得参加那个读书班的还有张伟国、何德章、罗永生等几位，先后在二院的小108和古代史教研室进行。田先生具体讲了什么，我自己和其他同学怎么选读的，我都不记得了，我只记得那几个月我有了醒过劲来的感觉，终于模模糊糊地明白了什么是“历史地看历史”。就是这个冬天，田先生突发心脏病。我们几个学生商量，继续这个读书班，去医院看望时，向他汇报了读书班仍在进行的情况，他还挺高兴。

经过了这一个“入门”的阶段之后，我开始考虑是否要一辈子做历史，具体地说，就是接下来是否读博士。在多年的自我期待中，我从没设想过要成为一个学者。就此前有限的接触，似乎学者人生也不见得有什么吸引力。现在田先生、祝先生等人为我开启了理解学术魅力的门窗，但我是不是准备好了要终身投入历史学的行业中呢？职业历史学家的身份，意味着一种我很不了解、也未必向往的人生。进入硕士论文写作阶段，见田先生的机会多了一些，对他个人的了解逐渐增多，我慢慢地窥见了一个学术人生的新天地。那里没有我少年时代所向往的激烈慷慨、风谲云诡、人山人海和生死契阔，但却有我同样迷恋的透彻、从容、醇厚与仁义情怀。即使在最初接触的两三年，田先生已经向我展示了学术人生可以有多么美好，当然，那之后的二十多年，我只有越来越庆幸自己及时地走上了这条路。做自己喜欢的工作，过自己喜欢的生活，是田先生引领我进入了学术人生。

就我学生时期的学业及留校后的科研教学来说，田先生对我最直接的影响是那种持续的压力。他对年轻人总有很高的期望，对我也一样，而由于我常在他身边，这种期望就成了巨大的压力。虽然我的抗压能力不弱，但自知之明还是有的，有时会有深深的、无处可诉的愧疚。1998年夏天我陪他去南京参加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的年会，晚上去鼓楼上喝茶乘凉，闲聊中他说，你留校好几年了，该出一点有份量的东西了。对于一个东游西逛还没有找到出路的研究者来说，“有份量的东西”似乎是遥不可及的。我说，您呀，对我要求不要太高了。没想到他忽然严肃起来，说道，我可以对你要求不高，但你对自己不能没有高要求。这个话让我想了很久。2003年出《拓跋史探》时，他在前言结尾处写道：“北大的罗新君与我长年相处，协助我搜寻资料，斟酌意见，操持各种繁杂的修改事务和电脑作业，而且反复再三。罗新现在远在哈佛大学访问研究，我期待他带回成果。”书出版后，他让正在北大读研究生的刘聪寄了三本给我。刘聪在附信里说：“同学们议论，说罗老师若是读到田先生这句话，会不会吓得不敢回国了？”很惭愧，那年夏天回国时我并没有带任何像样的成果。

我见过田先生修改别的同学的论文，密密麻麻的，有的都改花了，需要另写一页。但他看我的论文，基本不作文字的修改，总是和我谈议题的延伸意义，可能他觉得思考深度不够是我的主要问题。因为我本科是学文学的，早年曾痴心创作，读史不免为文字或故事的表象所障，思考问题容易停留在较浅层次，说话也常流露轻脱的一面，田先生非常耐心地、有针对性地引导我，对我的影响可说是至深至久的。比如，他看了我的硕士论文初稿后，对我说，就这样吧，剩下的时间去读别的书。过了几天他听一个同学说我的论文没有打草稿，本来是表扬的意思，但他立即把我叫去，要求我改写一遍，哪怕只是誊写一遍，说应该养成任何文稿都多次修改的习惯。我写博士论文时，每交一章，他都会反复询问还有没有可以深挖之处。那时我学力太浅，难以理解“深挖”的真实涵义，实在不堪他的追问之苦。但工作以后，我逼迫自己在讨论任何问题时都多想一层，看能不能在通常的解释之外找到更有深度的理解。我自己没有意识到，有一次徐冲提醒说我特别爱用“深刻”这个词，那么至少间接的成因是田先生多年的训练和压力。

很多人都称赞田先生会带学生，我根据切身体会和多年观察，感觉他是真正做到了因材施教、因势利导。我一开始对西域史地有兴趣时，他是鼓励的，认为

这样可以开阔视野，后来见我用力太猛，又提醒说不要偏离中原太远，不可忘记了拓展视域以反观中国史的初衷。这十多年我在内亚史方面用力稍多，略有所见，他一方面肯定，另一方面提示说，研究内亚史具体问题时，也要多想想与中国史的关联。正是在这样的提示下，我开始思考中国史中的内亚性问题。田先生在关键时刻的警示，帮助了我始终立足于魏晋南北朝史来观察周边，而不是游骑无归，“纵一苇之所如，凌万顷之茫然”，发展成半吊子的中亚史家或阿尔泰学家。他并不认为魏晋南北朝史比西域史地或内亚—阿尔泰研究这些学科更重要，而是因为他了解我的训练背景和知识局限，知道我的长短和特点，才会及时提醒。据我观察，他对其他学生学术发展的建议和提示也都是基于学生自己的特点。比如李万生博士论文关注的是侯景之乱时期的河淮地理问题，田先生觉得万生硕士时在陕西师大有过历史地理的训练，以此研究侯景问题，可能会别有所见，所以是很鼓励的。到万生博士毕业，论文也快要出版的时候，田先生就劝他另寻题目，拓宽研究范围。田先生是这样说的：“做研究应该多一些切入点，就像村屯邑居，要多挖几口井，你到现在只挖了这一口井（侯景）。”

不过我必须说，田先生对我最大的影响也许还不是，或不仅仅是在学术方面。我之所以走上学术之路，不仅因为感受到了历史学的魅力，还因为看到了学术人生的可贵。这两个方面田先生都起了决定性作用。其实大多数学者的人生并不一定令人羡慕，学界生产的大多数论著也未必值得喜爱，可我的幸运在于，初涉学术之时，我就遇到了田先生。那种安详淡定、远离流俗的精神和生活状态，让我有一种找到归宿的踏实感。二十多年来，田先生时时刷新我对于人生的理解，我看到了学者的纯粹和人生的朴素。他经常聊起过去的人和事，固然也流露对于恶政当道的愤怒，但对那些在极端时代做了许多坏事因而后来恶名昭著的人，他似乎总有一种深深的悲悯，甚至以同情的语气讲述他们的人生遭际。反过来，一些后来被评价很高的名流人物，到了田先生的回忆里，原来也做过许多他们后来竭力回避或予以否认的事情。我甚至觉得，田先生研究历史上群体和个人在时势变局中的反应与选择，多多少少隐含着他自己人生所见所闻所思的总结。

这十年来，很多人鼓励田先生写回忆录，都觉得以他的丰富阅历、史家见识加上出类拔萃的文笔，肯定会写出有历史价值的回忆。他一再拒绝，说出来的理由是自己一介书生，人生平淡，没有经历什么特别的波澜。但我感觉，田先生不肯写回忆录，除了谨慎的性格原因外，还有他对于自己所经历的 20 世纪悲剧般的历史似乎不愿进行系统的反思。以田先生的思维和写作习惯，他写回忆录必定与研究历史没有什么不同，而研究自身经历过的 20 世纪，和研究遥远的中古不同，似乎难以避免会时时沉浸在巨大的疼痛之中。除非万不得已，他不大愿意写怀旧思往的文字。这些年他只写了不足十篇的回忆短文，都已集入去年出版的《师友杂忆》。他在序言里说：“杂忆所及北大师友，多是受过苦难的，尤其是翦伯赞先生，是大苦大难。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容不下这样一批有过辉煌但已年迈的文化人？”这个感慨的背后，是无可言说的愤怒和无边的悲凉。这二十年来我大概是和田先生联系最多的人之一，聊天不算少，但我对他过去的经历还是所知有限，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他并不那么喜欢怀旧，我猜想那还是因为“过去”本身过于沉重了。

有个道理我是近几年才明白的。我有时会讲自己在北大同事中的朋友圈子，

田先生也问得特别仔细。我告诉他，我和丁一川、张帆、陈爽是读书时的狐朋狗友，常年一起鬼混，亲如兄弟，后来又和同事李新峰、郭润涛等成为好友，形成了一个感情很深的小圈子。田先生评论说：“你们现在很幸运，同事也会成朋友。”我非常吃惊，多年同事成为朋友，难道不是很正常吗？他说，经历了 50 年代至“文革”的高校和科研机构，同事变成朋友是很难的。后来又听他讲 50 年代北大的“洗澡”，即使在老教授们之间，一些过去每周一起下馆子的亲密朋友，也被发动起来互相批判，互揭隐私，多年友谊一朝荡尽。他举的一个例子就是对杨人楛的批判，最激烈的攻击就来自一个老友。后来政治形势越来越紧张，同事之间哪还敢有什么私交、私情？私下说话也都是字斟句酌，唯恐一言不慎，哪天被揭发出来成为罪证。我这才明白，怪不得我一直觉得北大的同事之间过于“君子之交淡如水”，原来也是一个历史阶段的遗产。

田先生的政治史研究都局限于中短时段，着眼点也都是时势推动下个人或小型人群的政治选择。在《东晋门阀政治》中，虽然他为这些历史人物的重大行为整理出了一个政治史的解释线索，但他回避了对“时势”本身的深层次解释。那时他对“历史进步”还抱持一定的信心，考察时势成因的动力比不上对发展趋向的期盼，因此会有全书最后一段那种俯瞰历史的浪漫和激情。到了《拓跋史探》，他似乎要提供一个更深的阐释，探明历史中的那些野蛮、血腥和黑暗，如何又发挥出推动历史变动的力量。基于这种理解，我在 2008 年为《南方周末》推荐阅读书目时，列入了《拓跋史探》。我是这样解释的：“熟读过田余庆先生《东晋门阀政治》和《秦汉魏晋史探微》的朋友，很多都容易对《拓跋史探》持一点保留，认为无论在选题上还是在具体的考证上，甚至是在文字表达上，都没有能够超越《东晋门阀政治》。当然，《东晋门阀政治》是 20 世纪中国史学的重要收获之一。而《拓跋史探》是属于新时代的，尽管显露出作者老年写作难以避免的种种遗憾，但凝聚着深刻的时代体验和历史反思。与《东晋门阀政治》的乐观昂扬不同，《拓跋史探》浸透了对未来的疑虑和对往昔岁月的感伤，前者表达了 20 世纪 80 年代知识人的热情与希望，后者则源于乐观情绪被打消之后的沉郁深思。”

1997 年初夏田先生在北医三院住院，我下午常过去陪他在住院部下面的花园散步。他说自己身体不好，自幼如此，别人说他能活到六十就算不错，没想到能活到七十多岁。前几年又是在北医三院住院，我陪他聊天，旧话重提，说您七十多岁就有这般感慨，大概没想到会有今天吧。他呵呵直乐，但又说，唉，做不了什么事。我就说，九十岁还要写书，不是成精了吗？其实他直到去世，始终心系学术，尤其关心最新论著和年轻学人的情况。我似乎是有责任定期向他报告近一段时间出版了什么好论著，冒出了哪些年轻人。学界后辈去拜访，他也必定打听最新动态。他有时会指示我延请青年新秀来家里坐坐。2013 年年底，他还询问魏斌、仇鹿鸣等几位的情况，表示要读他们的新著。2014 年 11 月我在微博上看到仇鹿鸣看望田先生的照片，就在电话里提到。田先生问我在美国怎么还能知道，我说是网上看到的，他很惊诧：这件事还能上网啊。

我因在 2014—2015 学年度到美国访问研究，最不放心的就是担心老人家寂寞，所以广托朋友常去看他，陪他聊天解闷。我每周和他电话聊天，他会介绍最近谁来过，读过哪些文章。虽然他也感慨自己精力不济，每天读书不能超过两小时，而且随读随忘，但也很达观地说，老了嘛，也只好这样了。夏天我曾跟他说

北大历史系的研究生潘敦正在写北魏的皇后与可敦问题，到10月间他表示想读，让我告诉潘敦。潘敦就把文章打印件给他送去了。两周前，他在电话里说，他读过了，有些意见，让我通知潘敦去见他。我竟然没有及时告诉潘敦！12月27日去八宝山举行遗体告别之前，我在老人家书房里坐了一会，看见书桌上摊开的书和文章中，就有潘敦那篇文稿，他还在等着和潘敦谈他的想法呢。在摊开的另一本书旁边有个纸条，写着我的电话号码。

昨天去田先生家，陪师母聊天，走的时候，师母忽然怔了一下，对我说，唉，你看，我糊涂了，我正要对你说，你走怎么不跟先生说一下呢。师母说她常常犯糊涂，总觉得先生还在。他们两位自1947年恋爱，1950年结婚，到相守终老，已经六十四年了，师母怎么可能适应先生已不在人世的事实呢？不要说师母了，就是我这个晚辈，到现在也难以相信竟然已永远见不到他。走在蓝旗营小区里，感觉就是去见他老人家的。在这样的迷迷糊糊中，写这篇匆匆忙忙的纪念文字，就如谢灵运的诗句：“举声泣已洒，长叹不成章。”

2015年1月2日北京五道口

（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）

《文汇报》2015年1月9日《文汇学人》